1. 政策导览

(1)政策文件

■ 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发布《文化部“十二五”文化科技发展规划》

2012 年 9 月 12 日，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发布《文化部“十二五”文化科技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指出，“十二五”时期我国文化科技发展正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与跃升期，然而我国文化科技发展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深层次问题：文化科技发展还不能很好满足国家文化发展的需求，文化科技自主创新意识与能力有待增强，文化科技创新投入严重不足；文化事业发展中新技术集成应用较少，文化产业技术研发与创新水平偏低，相关基础和前沿研究比较薄弱；企业文化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亟待加强，产学研用结合不够紧密，文化科技队伍建设需要加大力度，高层次创新型文化科技人才匮乏，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高，自主创新政策落实需要进一步深化。

文化部要求发展文化科技要以自主创新、重点突破、系统推进、引领发展为原则，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如下目标：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基本完备，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科技竞争力显著增强，文化重点领域核心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文化行业标准化体系相对完善，文化科技基础环境条件得到改善，科技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共享明显增强，文化与科技融合在深度和广度上取得实质性推进，有力支撑和引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规划》要求加强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优化文化科技创新发展环境、加强文化科技创新载体建设、强化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功能、发挥科技项目引领带动作用、加快文化行业标准规范制定、汇聚文化科技专业人才队伍。

《规划》还明确了文化科技发展的重点工作任务及领域，主要涉及五个方面：文化科技基础性工作、文化艺术资源保护与开发领域、文化艺术产品创作生产领域、文化传播与服务领域、文化装备与系统平台建设。

（据文化部网站摘编，2012 年 9 月 20 日）

■《北京市主体功能区规划》发布

2012 年 9 月 17 日，《北京市主体功能区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出台，该规划的基准年为 2010 年，主要目标年为 2020 年，规划范围为北京市行政辖区。《规划》深化了各功能区域发展定位、发展目标、发展原则、发展任务和保障措施，今后北京国土空间开发将从外延扩张为主转向优化空间内部结构为主，城市空间在优化中得到适度控制，历史文化风貌得到严格保护，生态空间得到有效拓展。

首都功能核心区将以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为宗旨，坚持以存量更新为重点，改造硬

件与丰富内涵并重，以小规模、渐进式为主，防止大拆大建，严格限制大型医疗商业设施新建扩建。对城市功能拓展区要重点开发，要坚持产业高端化、发展国际化、城乡一体化。城市发展新区近期将重点建设通州国际新城、昌平未来科技城两个重要新城，打造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区。生态涵养发展区重点培育旅游、休闲、康体、文化创意、沟域等产业，围绕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40多个古村落，挖掘历史文化内涵，推进文化古村落建设与修复。

《规划》在四大功能区之外，首次设立了“禁止开发区域”，该区域为禁止进行工业化城镇化开发、需要特殊保护的重点生态空间，约占市域总面积的18.4%。禁止开发区域共分六类，包括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和重要水源保护区。北京市将尽快制定或修订地方性配套法规和规章制度，同时还将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和分类保护机制。

（据《北京日报》摘编，2012年9月18日）

(2)政策解读

■ 牵手科技，让文化产业“一路驰骋”：解读《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纲要》

《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纲要》自今年5月颁发以来，在文化产业界持续引发热议。对于如何以科技助推文化产业优化升级、如何加强文化科技发展的环境建设等问题，专家们结合实际，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

对于在良好的宏观环境下，如何将文化科技融合落到实处这一问题，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科技司副司长孙苏川认为：“最基本的是要有专门的技术系统。”水晶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CTO庄岩则深感核心科技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具体操作上，首先应把各种科技要素分类，找出核心科技这把“金钥匙”。鉴于新技术更新换代快的特性，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海明主张“鼓励引导新技术融入到传统技术中，实现技术的效益最大化。”

文化科技融合不可能一步到位，应从抓好一批“先行先试”的重点基地开始，充分发挥示范基地“辐射效应”。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副司长王丰认为：“文化基地能够融合文化与科技，解决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因此，可以重点培育一些有示范效应的优势文化产业，辐射带动其他产业，从而构建起覆盖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推动科技文化发展。”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主任梅松，呼吁多培植一些科技融合创新的领军企业，“并给予它们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纲要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产业发展与政策制定之间不同步的矛盾，王丰认为“有了纲要，必须尽快出台相关配套政策与实施细则。”田海明建议，一定要解决行业标准问题，尤其是“新兴行业新标准问题，传统企业的国标修订问题和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如何结合的问题”。梅松根据北京市的经验，认为除了法规政策的完善，激励机制的建立同样重要。

（据《光明日报》摘编，记者王斯敏，2012年9月12日）

■《文化统计管理办法》解读

近日，文化部财务司领导对9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文化统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做了详细的解读。针对当前文化统计工作中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办法》重点做了以下几方面的规定：

(一)关于统计数据质量问题。针对统计数据质量不高的问题，《办法》要求“文化统计调查对象应当依照统计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文化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文化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如实搜集、报送统计资料，不得伪造、篡改统计资料”；文化统计人员应当“对其负责搜集、审核、录入的统计资料与统计调查对象报送的统计资料的一致性负责。”对于如何保证统计数据质量，《办法》规定：“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文化统计调查质量控制体系。在搜集统计资料的同时，应当采取现场核查、逻辑检验以及其他有效方式，对统计资料进行审查和核实。”

(二)关于统计机构和人员问题。针对当前统计力量薄弱的问题，《办法》从多个角度做了规定，其中第四章全章从机构的设置和职能、人员的配备和职责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三)关于统计工作规范问题。《办法》规范了文化统计调查的流程，统计资料(数据和信息)的审定、发布、使用、归档等，文化统计机构的设置和职能、文化统计人员的配备和职责、综合统计机构和业务统计机构的职责分工等。

(据文化部网站摘编，2012年9月5日)

■ 鲁炜：北京建五大体系促进文化科技融合

在9月22日召开的“2012中国文化产业30人高端峰会”上，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鲁炜详细介绍了北京市未来促进文化科技融合的五大体系。这五大体系包括文化科技创新体系、文化科技成果的应用体系、文化科技融合的承载体系、文化科技融合的市场服务体系、文化科技融合的支持体系。

北京将组织认证一批文化科技企业，引导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要素集聚，着力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成果转化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加大对技术创新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研发制定文化科技技术标准；着力建设中关村国家级文化与科技融合示范基地，着力建设重点市级文化与科技融合示范基地，支持文化科技园与文化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加强与相关部门对接，主动承接国家级项目，积极吸引外资项目，加快推进市级项目梳理、整合区县项目，着力推进一批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科技含量高、带动力强的重大文化科技项目；重点打造研发、信息、融资、交易、中介、流通、知识产权等7大平台；在政策上组建文化科技融合与企业联合认定小组，完善认定标准，在项目、资金、用地等方面先行先试，在人才培养上用足用好市级人才引进，中关村人才特区等人才政策，建好人才的发展平台。

(据中国经济网摘编，记者张翔，2012年9月25日)

■ 有约束方能留住古都风貌：解读《北京市主体功能区规划》

新出炉的《北京市主体功能区规划》首次设立禁止开发区域。北京市此番公布的禁止开发区域涵盖全面，指向具体，要求也相对明：除了“必要的交通、保护、修复、监测及科学实验设施外”，禁止任何工业化、城镇化的开发建设。新规凸显出来的是“约束性”，不允许任何部门、组织以及开发单位以任何名义打擦边球了。

一直以来，“发展”的语境主导了我国大部分城市的现实和未来，即便制订规划，其主旨也是立足于扩张，这导致了各种“城市病”的出现。过度依赖房地产拉动的城市扩容，破坏了城市自身的微循环，在政策和市场的合力之下，老城区原住民被挤出，老城商业形态、生活形态均遭到强力干预，而新的形态又未能及时生长起来，于是城市丧失了丰富性，只剩下表面的、虚浮的繁荣。并且，利益主导之下的城市化，正在一点点蚕食城市的历史文化风貌，新城次第崛起，而城市的味道、城市的风貌却无可奈何地流失了。

北京市这一“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可贵之处，正在于贯穿其中的“约束”和“节制”。今后，北京国土空间开发将从外延扩张为主转向优化空间内部结构为主，城市空间在优化中得到适度控制，历史文化风貌得到严格保护，生态空间得到有效拓展。这样的“约束”和“节制”所体现的，既是城市发展的理性，也是对规划本意的回归，而非对扩张的事后确认。这是任何城市的发展都应该有一种约束的理念。

（据《中国青年报》摘编，记者胡印斌，2012 年 9 月 19 日）

2. 动态关注

■ 2012 文化创意产业(北京)峰会举行

9 月 19 日，2012 文化创意产业(北京)峰会举行，中外专家学者汇聚一堂，探寻文化创意产业新战略的新思路、新驱动的新支点、新发展的新亮点。文化部部长蔡武、市委宣传部部长鲁炜出席。

蔡武在会上指出，文化部将继续完善政策法规保障体系，加强区域、行业统筹分类指导，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造优质企业主体，推进文化科技融合创新培育新兴文化产业，着眼两个市场加快对外文化贸易发展。他对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希望北京市继续发挥全国文化中心示范作用。与会专家学者就“提升软实力——文化产业的融合与升级换代”、“文化兴业——文化创意企业的发展与资本运营”、“人才兴文——文化产业繁荣与人才的培养和管理”、“园区创新——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模式”等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峰会正式启动《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白皮书》项目，白皮书将由市文资办主持编纂，记录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轨迹，分享实践经验，积累可供研究的数据和文字资料，宣传推介优秀的产业模式，是首本官方出版的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权威读本。市

文资办还在峰会上向13名文化创意产业专家学者颁发聘书，组建成立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专家顾问团。

（据《北京日报》摘编，记者王皓，2012年9月20日）

■《2012动漫蓝皮书》发布

9月18日，由多家研究机构的资深专家、学者及动漫企业精英共同编写的《动漫蓝皮书：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报告(2012)》(以下简称《蓝皮书》)发布。

《蓝皮书》指出，未来的5～10年，中国动漫产业将处在以发展方式转变为核心的又一次转型与改革的关键阶段。“十二五”期间，动漫产业不应该仅仅实现量的增长，更应该实现质的跃升，即从注重数量扩张的规模增长转变到更加注重质量效益的内涵提高上。

《蓝皮书》认为，“十二五”期间，推动动漫产业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需要抓住五大契机。一是通过扩大内需来充分释放民众文化消费需求，这是中国动漫产业大发展的基本支撑。二是大力开发应用动漫产品和服务，深度挖掘利用动漫手段服务社会的巨大潜在空间，这是中国动漫产业大发展的拓展方向。三是加速培育数字网络动漫业态，实现动漫产业超常规发展，这是中国动漫产业大发展的重大机遇。四是参与国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充分发挥动漫产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优势，这是中国动漫产业大发展的主攻方向。五是发展对外版权贸易，使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与促进文化贸易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动漫产业大发展的新天地。

（据人民网摘编，2012年9月18日）

■ 第八届《综艺》新媒体高峰论坛召开

9月27日下午，第八届《综艺》新媒体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国家广电总局相关领导、电视台代表、视频新媒体代表、业界专家、媒体记者等100余人出席了本届论坛。本届论坛以“全媒态·新融合”为主题，旨在探讨“全媒态”进程中的战略与合作，共促行业良性生态的有效构建和节目制播运营业务的顺势升级。此次论坛得到了国家广电总局的大力支持，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副司长高长力、广电总局网络节目司审核登记处处长刘少栋，分别莅临现场并做了政策宣讲。爱奇艺CEO龚宇、优酷土豆副总裁朱向阳、东方卫视副总监戴钟伟、凤凰视频原创总经理李鸣等业界人士也分别围绕“全媒态·新融合”发表了精彩的演讲。

（据综艺报社网站摘编，记者侯殿垚，2012年9月28日）

■ 2012艺博会26日在京开幕

“2012中国艺术品产业博览会”于9月26日晚在北京通州开幕。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明委副主任刘淇，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北京市代市长王安顺，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王仲伟，洛克菲勒财团家族代表、罗斯洛克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史蒂文·洛克菲勒二世等出席并致辞。据悉，本届艺博会为期7天，期间在通州七大展馆举办八项主题展览活动，对公众免费开放200家工作室和画廊，民众可“零距离”欣赏来自900余位国内外知名艺术家的近5000件作品。

（据中国网摘编，记者尹力，2012年9月27日）

3. 媒体聚焦

■ 白鹿 vs 小娥：《白鹿原》改编的功与过

编者按：电影《白鹿原》是根据被誉为“当代中国文学里程碑”的陈忠实同名小说改编而成，长达九年的筹备期、三年的拍摄制作期、“大尺度”的宣传片、延期上映，所有这些都吊足了广大观众的胃口，千呼万唤始出来，影片终于在9月15日上映。虽然许多人给予电影高度评价，陈忠实也为电影改编打上高分，但是各界对于影片的质疑之声也不绝于耳。

在接受《华商报》采访时，陈忠实表示：“电影体现出了小说中的精神内涵，能把人物展现到这程度，电影完成了它的使命。比起秦腔和话剧的改编要好。”（据《陈忠实谈白鹿原：打95分 一波三折我已麻木》，华商网－华商报，2012年9月15日）《陕西日报》撰文称赞电影《白鹿原》是“一部展示民族史诗的好电影”，能传达出“浓重的文化性、民族性和灵魂性”。陕西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张阿利评价说：“这是一部严肃的片子。中国不缺票房大片，缺乏的是这种既能让票房过亿，更有文化含量和文化承载的电影，《白鹿原》的意义就是打破中国电影娱乐化的格局，反思和倡导一种电影新文化。”（据耿银平：《一部展示民族史诗的好电影》，《陕西日报》，2012年9月21日）

让影片饱受质疑的一大问题在于，短短2个多小时的无法表现出原作史诗般的原貌，很多人调侃《白鹿原》被拍成了《田小娥传》。有记者评论道：“熟悉原著者可能会觉得电影寡淡无味，在不熟悉原著者看来，这就是一部《田小娥传》，只是半部《白鹿原》。”（据倪自放：《半部〈白鹿原〉寡淡无味》，中国网，2012年9月17日）“影片将原著中具有魔幻色彩的白鹿传说以及朱先生、白灵、鹿兆海等主要人物略去不表，只选取了白家轩、鹿子霖、鹿三、白孝文、鹿兆鹏、黑娃几个关键人物展开叙事，专注于通过白、鹿两家两代人的命运沉浮和感情纠葛来折射整个白鹿原的兴衰沉沦和那个年代的历史变迁。”这种处理方式让观众不满、原作者遗憾。（据李蕾：《电影〈白鹿原〉上映引各界争议》，《光明日报》，2012年9月26日）电影的2小时和原著的50万字之间的比例显然是不对等的，对于电影改编，导演也许不应该让一部电影承载过多的内容，不妨学习国外经验，把电影拍成多部曲。（据郑照魁：《〈白鹿原〉成了〈田小娥传〉?》，《南方日报》，2012年9月19日）

获得差评的另一大原因在于，许多人认为电影在用情色当做吸引眼球的噱头。有人

批判影片用“‘下半身表达’异化了原著”，认为虽然小说原著中也有情色的暗示，但是电影把这种暗示过分放大了，从头到尾的充斥着这种下半身表达，从而导致电影的意味发生了变化。(据倪自放：《半部〈白鹿原〉寡淡无味》，中国网，2012 年 9 月 17 日) 此外，电影的剪辑、情节取舍、导演的把控能力等问题也成了多方质疑的对象。

■ 创新还是亵渎?：“京剧比基尼”引热议

编者按：近日，一组国际比基尼小姐身着比基尼、戴着京剧头饰、进行含有京剧元素的比基尼秀的照片，在网上广为传播，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激烈争论。虽然赛事主办方对外声明此举目的在于借用新形式弘扬传统文化，但许多人认为，这种做法是在玷污国粹、亵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有人认为不用过于神经紧张，主张对其采取宽容的态度。

《中国青年报》指出，京剧和比基尼是两种完全不相干的、甚至是相互抵触的文化，“比基尼肤浅低俗的外在美”不能“与京剧的古典美、文化美、思想美相提并论”。将二者“混搭”，“不仅碰撞不出时尚的火花，反而会让人觉得，此举不过是借助京剧的‘文化外衣’来达到‘另类诱惑’，颇有点卖弄风骚、让京剧成为‘情色闹剧’之嫌”。记者认为这种做法有辱于我国传统文化，主张有关部门“对这类为了赤裸裸的经济利益，而不尊重甚至是糟蹋传统文化的赛事”，进行整顿和处罚。(据何勇海：《“比基尼京剧”不是创新是亵渎》，《中国青年报》，2012 年 9 月 26 日) 有文章认为，京剧艺术虽然在当下式微，需要注入创新精神，但是这也“必须符合艺术的发展规律，要被更多的大众所接受和喜欢”，而不能生搬硬套。(据吴为忠：《比基尼是传播还是亵渎京剧》，《新民晚报》，2012 年 9 月 26 日)

也有人认为应该采用包容开放的心态开看待这一现象，反对一种文化“守财奴式”的心理，把传统文化看做“不许摸不许碰”的东西。相反，赛事主办方的做法正印证了一种文化认同，他们认为“一方面京剧可以代表中国”，另一方面“京剧这一传统文化是可以、也是可能被赋予新的价值标准的。”(据曲晟：《是不是误会了“比基尼京剧”?》，新华网，2012 年 9 月 25 日)《华西都市报》则认为现在对于这种现象吹捧或棒杀都为时过早，虽然主办方的做法有低俗肤浅之嫌，但对于新事物还是要予以鼓励，“只要有利于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刻意制造的‘惊艳亮相’当也在包容之列，至少可以拓展人们的思维空间”，只是这种创新不能停留一直在低层次上。(许薇：《“京剧比基尼”：别棒杀也别捧杀》，《华西都市报》，2012 年 9 月 25 日)

■ 声之善恶：“中国好声音”的是与非

编者按：从今年 7 月份面世以来，“中国好声音”这一大型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一直就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一节目能够取得巨大成功，与它在引进和制播等运作方式上

的创新是密不可分的。虽然在制作播出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各方对它一直有质疑之声，然而在决赛落幕之时，这些声音一夜猛增，铺天盖地。

中广互联网站曾做专题全面深入地探讨分析“中国好声音”如此火爆的原因：首先，引进国外成功的节目模式，创新节目形式，精准定位、盲听盲选、采用平易近人的交流方式、让主持人退居幕后；其次，合理集合多方面的力量，采用台网联动的方式进行制播，传统的电视台与互联网新媒体深入合作、深度联动。(据苗梦佳、鲁晨：《“中国好声音”是怎么修炼的?》，中广互联网站，2012 年 9 月 11 日)“中国好声音”最具吸引力的招牌在于它的“盲听盲选”的选秀的方式，因为人们认为这能保证节目的公正公平，它可以被视为“中国音乐梦想秀”：“提供一个更趋向公平公正的平台，不论出身背景、不拼爹、不搞潜规则，掌握人事决定权的评委都能蒙眼张耳，尽量做到为每一个真正的好声音拍钮转身”。它的走红并不是因为其满足了普通大众对音乐本身的期待，而是因为它“符合人们内心对公平公正的渴望”。(据沈泽玮：《中国社会渴望公平舞台》，新加坡《联合早报》，2012 年 9 月 1 日)

当“好声音”进入“考核”阶段，不和谐的因素就在不断增多，而到了尘埃落定之时，更多人在反思“中国好声音”一路走来的这两个多月，原本最有吸引力的公正、公平逐渐遭到质疑，“随着各种‘真相’的层出不穷，人们对‘好听的声音’已显麻木”，“《中国好声音》在鹤立鸡群之后，反而缩回到了超女、快男时代那个对个性、张扬、异类的极端追求的原点上”。盘点“中国好声音”给我们带来多少收获，主持人林白这样说，“‘好声音’让中国观众集体爆发质疑精神，核实真伪，去伪存真，摒弃滥情的廉价审美，中国观众早该补上这一课了。”(据陆飞：《“好声音”收声 选秀季收获几何?》，北青网，2012 年 10 月 1 日)

4. 尖峰观点

■ 张慧瑜：“宫斗热”与个体化时代的生存竞争

后宫剧这一当下最流行、最具话题性的文化现象，已然成为当下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想象历史和言说现实处境的最佳隐喻。也正是因为这些以《后宫·甄嬛传》为典型的后宫剧精准地“刺痛”了时代的神经，它们才能够大获成功，从它们的接受情况能看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更为严酷的社会环境。

作者认为，这种文化现象并不独独存在于当下的后宫剧中，后宫剧与古装武侠大片(电影)、宫廷剧(电视剧)以及近期播出的电影等之间存在着“互文性”。从《英雄》、《无极》、《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大片中可以看出，近十年来古装武侠大片基本在讲述同一个故事，就是如何从“江湖”走向或认同“宫廷”的故事，党同伐异、尔虞我诈的后宫取代了善恶分明、自由自在的江湖。而《雍正王朝》、《康熙王朝》、《汉武大

帝》等帝王戏的文化功能，是通过呈现帝王的雄心与谋略来完成对强者、胜利者位置的确认。它们同样都是讲述胜利者的故事，从男人/皇帝到女人/妃子的角色置换中已然呈现了，一种白手起家、个人奋斗、创造“帝国”的成功故事变成了只能在既定规则、既定格局、既定秩序下成为既定的赢家的故事。从此可以看出，20 世纪 90 年中后期以来，中国社会从自由竞争的迷梦走向权力垄断与固化的深刻转型。管虎的新片《杀生》，其故事设置与《甄嬛传》中的后宫“铁笼”形成同构，主人公都处在是机关算尽、步步为营的理性化的“牢笼”，个体无法冲破这种牢笼，呈现出个人不过是理性机器的祭品的残酷事实。

《后宫·甄嬛传》呈现了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态：当政治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宫斗”时，政治形态一来变成了少数人的游戏，二来是变成了个人私利的权谋与算计，政治被想象为赤裸裸的丛林法则。而这种政治/历史想象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自 80 年代以来愈演愈烈，“人民”、“阶级”等集体的概念消失，个人的权力被大写，与之相对，20 世纪最为重要的通过动员和组织农民、工人等“大多数人”来实现政治革命的方式丧失了合法性。

（据张慧瑜：《“宫斗热”与个体化时代的生存竞争》，《文化纵横》，2012 年第 4 期）

■ 干春松：儒家如何参与制度重构?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干春松教授以为，100 多年以来，一直在被妖魔化和污名化儒家思想，将在日益恢复的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觉的趋势下，逐渐得到尊重和新的理解。在如何重新定义和理解“中国”的问题上，或者说什么样的因素可以被称之为中国因素，儒家思想或者儒家的价值乃是人们展开讨论不可或缺的因素。现在，中国正在兴起一场儒学复兴运动，这将对中国未来的价值重构和制度建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下中国的危机说到底是一种制度性困境，在经历一百年亦步亦趋的模仿之后，建构起一种符合中国人实际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制度体系，应该成为“大国的使命”。要完成这个使命，首先必须突破固化的意识形态束缚，根据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认同，重新将儒家价值作为国民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民教育、官员选拔等环节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对儒家的价值可以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以适应已然变革的社会现实，使之成为一种适应现代生活的价值基础。

在具体的制度设置中，儒家理念也大有可为。从可能性的角度出发，以下几个方面或是最现实的入手处：首先是信仰和礼仪系统，儒家在个人道德和信仰层面的作用可以救治当下的信仰危机；礼仪活动是培养价值认同、树立个人尊严的重要步骤，而儒家又擅于进行丰富的礼仪设计，如果能加以继承和改造，那将成为中国人恢复礼仪生活的重要基础。其次是民间社会秩序，在农村如果能适当利用祠堂为纽带的家族力量，作为行政系统的必要补充，将会使之成为有助于生产互助和行政监督的重要手段。最后，我们还可以期待儒家的政治理念对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甚至世界秩序的建立贡献力量。现代

的民主制度和儒家所推崇的贤能政治之间，可以找到一种“重叠共识”；如何发挥精英群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尤其对党派政治无法真正展开的当下具有一定的意义；对于期望在国际舞台大有作为的中国而言，儒家所提倡的多元共存、寻求超越民族国家利益共同体的天下观念，也将会对改造以联合国为主体的现有国家间关系架构提供新的思路。

（据干春松：《儒家如何参与制度重构?》，《南风窗》，2012 年第 19 期）

■ 刘康：中国城市国际化的文化导向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刘康教授指出，所谓城市国际化不仅是经济“硬实力”的反映，更是社会“软”环境的营造，特别是法治环境、城市管理、政府服务、人文环境，让世界不同肤色的人心向往之，愿意来旅游、度假、工作、创业、居住。目前中国城市化存在着一大软肋——文化的缺失。对于城市而言，文化一点都不玄虚，而是关系到人文关怀，是对城市每一个个人的关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太快，经济与科技优先的战略是中国现代化速度与效率的直接推手。但高速发展在城市化过程中，推倒的是许多旧的建筑和街道，忽略的是城市的历史、城市的故事、城市的独特风情和市民的独特生活方式，或曰城市的精神。

在对旅居上海和南京的外籍人士的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理解的城市国际化与我们的差异。受访者会把上海视为“文化中心”，他们一再确认上海的外滩、城隍庙、上海的中西混合的独特街道和建筑是上海的国际地标，选出上海人独有的国际眼光和生活方式作为上海国际化的特征。在南京的外国人则高度肯定南京的生活环境、文化历史氛围，以友好、舒适、便利、归属感、绿色、安全、文化历史底蕴深厚为主题词，盛赞南京的人文环境。这些中国城市的外国居民认为中国城市国际化有两种趋势，一是面子工程，二是中外有别，社区隔离，而不是不同国家和种族间在各种领域的广泛交流与融合。他们眼中的“国际化”意味着怎样使城市更加易于外国人工作、居住和生活，为其提供友善便利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目前来说，许多城市的“国际化”只是单纯建造外籍居民专享的学校、超市、社区等，却不在如何与本地居民融合相处的问题上多下工夫，这种观念是需要转变的。

南京的城市发展目标定位令人欣慰，建设现代化国际性人文绿都，把落脚点坚实地放在“人文”和“绿都”，放在城市的深厚历史和故事与传奇之上。人文关怀、历史传承，为中国城市化和国际化找到了一条明晰的思路。从大处讲，中国的城市化国际化，要以人文关怀、历史传承来与人类普世价值接轨，彰显中国现代化的精神与价值内核。作者期待，中国的城市化、国际化由此走出一条具有全球示范意义的道路来。

（据刘康：《中国城市国际化的文化导向》，新加坡《联合早报》，2012 年 9 月 10 日）

■ 包亚明：城市交通与“汽车社会”的来临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包亚明研究员认为，中国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跨过了“汽车社会”

的门槛，城市通勤痛苦指数与日俱增，城市交通拥堵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是摆在国人面前的一道难题。面对已经降临的“汽车社会”，我们尚且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汽车的制造和使用与城市交通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汽车制造业发展减速，政府非但不出台政策进行扶持，反而纷纷出台汽车限购政策，这表明上看起来是日益增多的机动车与有限的城市空间和道路资源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汽车消费税等税收体制的不合理，促使地方政府乐于采用拍牌、摇号和限购等简单办法，来解决汽车与城市空间使用的复杂问题。利益驱使，使得地方政府一方面为了缓解道路拥堵而采取汽车限购政策，另一方面又为了保护本地汽车企业而实施地方补贴，因为地方税收主要来源于工业项目，当车市下滑影响到本地车企销量的时候，地方政府又会转而补贴汽车消费。要解决这一问题，急需深化分税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权关系。

从城市规划、燃料供应、道路建设、停车场建设，到管理体制机制、汽车文化、售后服务等各方面，我们对于汽车社会严重准备不足的问题有许许多多。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关注到技术、管理和体制机制三个层面因素。从技术角度看，要倡导和推广少耗能、更环保、更具可持续性的驱动方式，完善路网建设，开发智能交通、慢行交通体系；管理上，通过市场手段，限制汽车使用频率，增加使用成本，抑制不合理需求，同时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完善体制机制，协调政府、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合理分配利益。

（据包亚明：《城市交通与“汽车社会”的来临》，《文汇报》，2012 年 9 月 24 日）

5. 学界观察

(1)机构动态

■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主办 2012 中国文化产业 30 人高端峰会

9 月 22 日，由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承办的 2012“中国文化产业 30 人高端峰会”在朝阳区规划艺术馆召开。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鲁炜，朝阳区委书记程连元出席论坛并致辞。来自国家有关部委、北京市相关部门、朝阳区的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等 20 余所科研院校专家和学者，京外省市文化机构代表，部分国家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文化产业重点企业代表出席了峰会。

本届峰会以“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为主题，集中对“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的双轮驱动、提高文化与科技融合的集约化水平、提高文化创新能力、加强传统文化产业的技术升级、加快推进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加快文化科技人才培养”六大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据中国传媒大学网站摘编，记者卜希霆、齐骥、赵一萌，2012 年 9 月 24 日）

■ 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举行“现实的城市与梦想的城市”国际学术研讨会

近日，由法国驻华大使馆与杭州师大联合主办、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协办的

“现实的城市与梦想的城市”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师大举行。法国驻沪总领事馆总领事卢力捷，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人文院主任、法兰西院士巴斯蒂夫人，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主任王国平以及来自中、法、英、日、韩、越、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围绕“现实的城市与梦想的城市”这一主题，专家们聚焦城市现代化、国际城市经验、城市转型、文化遗产保护、治理以及梦想城市等热点问题，展开积极的对话和广泛的讨论。据了解，这是法国驻华大使馆在中国首次举办的城市问题研讨会，也是首次与中国地方高校合作举办此类国际研讨会，明年会议将在首尔举行。

（据杭州师范大学网站摘编，2012年9月28日）

(2)学者观点

■ 马明：文化产业专项资金急需绩效评估

伴随着文化产业专项资金投入规模和项目的日益增多，在申请、审批、追踪监督及评估等环节出现了诸多问题，如专项资金偏重于国有大型文化企业和项目，资金的实际收益较低；行政程序偏于繁冗，申请成本高等。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相关部门的工作重心还停留在项目审核和资金发放等执行效率方面，忽视了关于专项资金实际使用效益和效果的评价，缺乏系统性的绩效评估机制。

文化产业专项资金绩效评估既是公共财政支出弥补市场失灵、提升政府资金使用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客观需求，又是文化体制改革中规范文化行政部门职责和转变服务职能的主观要求。借助绩效评估机制，更利于明确专项资金投入文化企业或项目预期结果和实际产出之间的效果性，更利于明确生产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性和效率性，更利于明确执行工作机制的公平性。然而，这种评估受限于政策条件和部门间的利益冲突，还停留于传统的资金财务审计。

文化产业专项资金绩效评估主要内容包括关于资金委托执行机构的对内考评和项目执行机构的对外评估两方面。一方面，必须明确资金委托方、执行部门和第三方评估机构的权责，保证资金的申请、审批及监督等程序透明，保证资金管理费、审批标准及结果等信息对外公开，利用执行机构的年度评审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针对文化产业社会效益隐形化和业态多元化的主要特性，结合一般专项资金的操作实务，编制多维度且可操作性强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明确相关的指标标准和评估方法，对于获得资金扶持的企业或项目进行切实有效的周期性评估考核，利用评估结果规范和调整资助工作。

当前文化产业专项资金的工作必须从过去的效率性向效果性、经济性和公平性拓展。不仅要以最低的经济成本获得更多的文化商品和服务，推动文化消费，更要在公共服务平台、社会影响、文化建设及生态环境等社会效益方面多有作为。相关的决策和执行部门应该尽快启动配套的绩效评估机制，制定科学且合理的指标体系，提升专项资金

的优化配置，推动文化体制和文化产业的深入发展。

（据马明：《文化产业专项资金急需绩效评估》，《中国文化报》，2012 年 9 月 15 日）

■ 甘会斌：中国城市空间的虚无化

中国城市空间正变得越来越没有特色，在直观印象上，一个城市很难区别于另一个城市，城市精神或城市气质荡然无存。所谓空间的虚无化，就是空间的社会属性减少、蜕变成纯粹物理空间的过程，是空间的工具理性增加而沟通理性减少的过程，是系统向生活世界殖民的过程，也是作为身体和意识的自然延伸的空间转变为外在的、异化的、无涉身心的空间的过程。这样虚无化的转变正在中国各城市全面展开。

北京的发展典型地再现了中国城市从实在走向虚无的历程。古都北京无论城市设计还是建筑风格，在国际上有口皆碑，被认为是在有限而持久的形式中蕴藏着无限的文化理想。贝聿铭以为，北京古城是世界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杰作，是中国历代都城建设的结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连同上海等中国城市越来越像“典型的”国际大都会，正是在这“典型化”的过程中，城市的一些非典型的、个性化的东西悄然隐退了，北京沦为“二手货的城市”。

城市空间虚无化的主要动力机制，在瑞泽尔看来，是增长全球化的三大次过程，即资本主义、美国化和麦当劳化，宏大的结构和力量压倒了本地，吞没了个人与团体创造自我和他们的世界的能力。中国城市空间的虚无化除此之外，还有特殊原因。一是政府权力的高度干预：政治因素主导着城市规划理念，城市规划往往被当成政府工程、政绩工程，被置于个人主观意志之下，沦为实现其政治雄心的手段，而市民在城市发展中往往处于沉默和无权状态，甚至连建筑师也没多少话语权。二是中国的文化贫弱症：由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断裂，我们丧失了可以转化全球化和虚无力量的文化根基，文化上不能自立的民族只能充当虚无力量的同谋。

中国城市空间的虚无化，所牵涉的不仅是城市竞争力或在未来世界城市格局中的地位问题，更是中国的民族文化以及各城市的地方文化的生存、传承、衔接、转型的问题，是市民的文化认同和地方归属感的问题。这里的城市文化不是政治经济所利用的工具，它直接关系人的存在状态、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只有我们认识到这点并贯彻于城市发展之中，也许才能稍稍抵制或限制城市空间的虚无化及相伴的问题。

（据甘会斌：《中国城市空间的虚无化》，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网站，2012 年 9 月 3 日）

■ 王颖等：中国特大城市的多中心空间战略——以上海市为例

以上海为典型的我国大多数特大城市，单中心蔓延和人口高度集聚于中心城区是城市空间体系最突出的特征，中心城区与郊区城镇间规模级差玄虚。单中心的城市空间格局是交通拥堵、生态恶化、房价上升、经济效益下降的重要根源。未来城市战略的走向，应该是在区域范围内建筑多中心的空间体系，其关键是次中心城市的形成。

上海的城市规划中虽然也提出要打造“反磁力中心”，希望以此来疏解中心城功能和人口，但是效果并不理想，目前上海新城缺乏吸引力，难以发展成为次中心城市。其原因在于新城功能定位偏低、就业吸纳能力不强、与中心城之间缺乏便捷交通联系、公共服务能级不高、社会认知度低以及与中心城住宅发展缺乏协调性。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开发管理体制分散和缺乏立法保障。

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把次中心城市建设放上海经济的新增长点乃至提高到国际竞争力的高度加以重视；第二，给予次中心城市以市一级经济管理权限，以便于政策聚焦和资源聚集；第三，优先发展联系中心城区与次中心城市及新城的快捷轨道交通；第四，次中心城市和新城要实现就业、居住以及生活的功能均衡；第五，合理调控中心城人口规模，促进城郊联动发展；第六，积极做好新城宣传和营销，让公众参与到新城建设过程中来。

（据王颖等：《中国特大城市的多中心空间战略——以上海市为例》，《城市规划学刊》，2012 年第 2 期）

■ 谢怀建：文化视域下的城市道路景观品质提升研究

文化视阈下的城市道路景观有三大意义：美学意义、艺术意义、文化意义。城市道路空间景观是城市文化的象征，它不仅有交通功能，同时更具备城市个性和城市独有的历史文脉，不仅是基础设施，也是城市文化的载体。

提高城市道路景观品质，必须充分考虑三大要素：道路景观的动视特征、城市文化的特点和民族审美心理特性。道路景观设计必须遵循人的视觉特点，要注重纵、横、平三方面的良好配合，使其三维空间得以良好结合，从而形成三维空间形象甚至四维空间的印象。要以城市文化与历史文脉为导向，通过对城市道路景观建设，形成城市空间的独特性和典型性，从而使中国的城市空间、城市形象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具有民族特色和文化特色。民族审美心理特性，是反映时代精神的审美心理特性，是有地域文化的心理特性，是和而不同的心理特性，它追求的是道路景观形态的“异”，避免的是“同”。

提高城市道路景观品质的路径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实现：一要通过人文路径注重从道路使用者的文化视角做好景观设计；二要从技术路径做好符合动视觉生理与心理的道路空间序列设计；三要从学术路径，建立起道路景观批评学。

（据谢怀建：《文化视域下的城市道路景观品质提升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12 年第 8 期）

6. 海外视野

■ 英国外包文化遗产保护引争议

日前，英国旅游与文化遗产大臣约翰·潘罗斯提出的“外包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案在英国引发了强烈争论。批评者认为，该提案等同于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私有化。

英国旅游与文化遗产部之所以希望外包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理由是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是一项高投入工程，将其外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关于外包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目前英国国内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可以尝试外包，但政府必须严格管理。另一种声音则完全反对外包，有人认为“如果只是为了节约成本，这样做无疑将给历史文化遗产带来危险!”

有专家表示，担心这种制度性安排模式缺少公正性，承包商指定的代理人无法保证真正的独立性。专家还认为，该方案的目的之一是弥补政府内遗产保护工作人员的不足，但是该方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这要求政府派专人核查代理人提交的验收报告。

在政府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引入私人资本维护文化遗产的做法在欧洲国家已经比较常见，一般都采用的是赞助资本的形式。外包则是完全不同的，将整个遗产都交给一个承包商的做法在欧洲范围内还实属罕见。

（据《中国文化报》摘编，记者邢立军，2012 年 9 月 17 日，来源：《纽约时报》）

■ 澳大利亚《媒体与文化研究》杂志策划专刊“重审智能手机时代的移动媒体”

在当代生活中，智能手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21 世纪的移动通信步入智能手机时代，并由此发展出了新兴的智能手机文化。

为此，澳大利亚《媒体与文化研究》杂志(2012 年第 5 期)策划了一期名为“重审智能手机时代的移动传媒”的专刊。专刊的导言指出，随着智能手机时代的到来，移动通信研究扩张到包括游戏、社会、定位媒体实践等广阔领域。通过放大围绕发生变化的媒体属性和通讯实践的诸多问题，在今天，智能手机已经成了反思文化和媒体研究的一大鲜明符号。智能手机一方面标志着一场媒介与技术聚合的运动，另一方面凸显了不断增大的社会—文化层级的分歧。本期专刊的目的就在于阐明构成当下智能手机文化的媒体的社会文化层次。

本期专刊选入了 6 篇论文，分别为约翰·密尔斯等人的《移动记者在行动：矛盾、社群、跨平台新闻业中的手机使用》、杰瑞·沃特金斯等人的《印度城市和农村的手机及智能手机使用》、Larissa Hjorth 和 Kay Gu 的《放置可视性的场所：关于上海智能手机可视性及基于位置信息的社交媒体的个案研究》、Orit Ben – Harush 等人的《健康和位置搜寻中的移动社交媒介及 GIS 应用》、克里斯蒂安·克里斯滕森等人的《装配、改编及应用服务：智能手机与移动游戏》、Gerard Goggin 的《谷歌电话兴起：安卓与开放源码的政治学》。这些个案研究凸显了对智能手机的不同认识，并为目前的媒体和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系列富有洞见的学术视域。

（据《媒体与文化研究》杂志网站摘编）

主　　办：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主　　编：陶东风　邱运华
执行编辑：符　鹏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3 号，100089
电子信箱：wenhuazhanlue@ gmail. com
联系电话：(010)68903449、68903576

(内部参考)